



學林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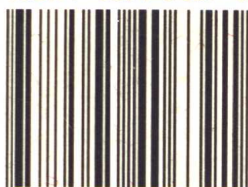
初編 下冊

张世林 编

朝華出版社

學林春秋

ISBN 7-5054-0639-6



9 787505 406391 >

ISBN 7-5054-0639-6/G·0189

定价:48.00 元(全套三编六册 定价 144.00 元)

學林春秋

初編
下冊

学林春秋

初编
下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

學林春秋

初 編



寧可苦而不教，不可不勞而後，以
此存心，乃有事業可成。

六十年前，以嚴謹剛正為宗旨，既老且
以此教誨，一舉一動見解如此，此幅
札語，遠矣，此語得即承紹，不
敢妄言，時時遵循，受教良多。

余德謹誌

● 史念海 (1912-)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ACG20/1509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

史念海

一 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之学的师承渊源

我和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接触,是始于1933年的秋季。这一年我正在大学里读二年级。当时谭季龙(其骧)先生在历史系讲《中国历史时期的地理》,我选修了这门课程。当时选修这门课程的一共五位同学。现在能够记得的仅有赵仲桓先生一位。谭先生的课讲得很好,上课时不发讲义或教本,仅带着几张卡片,有时连卡片也不带,还是滔滔不绝。虽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发讲义或教本,大家听起来都还很有兴趣。这些年来每与赵仲桓先生相晤,犹能细谈当年共读往事,历历分明,如在眼前。有时也道及其时如以讲义或教本见发,则相对翻检,当能更显现原来的课堂情景。

谭先生上课时,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顾颉刚先生,说到和顾先生合作,编辑《禹贡》半月刊,还拟创办禹贡学会,集合群力共同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的地理。谭先生要我们订阅《禹贡》半月刊,并加入禹贡学会,还鼓励我们为《禹贡》半月刊撰写文章。这样鼓励的言辞和讲课的内容,使我逐渐对这门学科发生兴趣,在这方面多费精力。应该说,谭先生当时所讲的乃是沿革地理,禹贡学会成立

后,英文译名虽然使用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名称,但具体研究的还是限于沿革地理,没有很多改易。

我认识顾颉刚先生是在1935年夏初。顾先生是我久已敬仰的学者,因为我在读初中时,所读的国文课本就是顾先生编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听到谭先生的称道,更增加我的敬仰心情。第一次和顾先生见面,是在谭先生的寓所,我当然很高兴。顾先生从他的皮包里拿出排印的校样,并说这是您的文章,请您校对一次。这在当时是我难以想象得到的。

就在那一年的暑期中,我住在北京景山西北围墙外一家民宅中。有一天黄昏时候,我正和几位友人在院中挥扇乘凉。天气很热,衣冠也就难得齐整。忽然抬头,看见顾先生已经进到院内。我们都大为吃惊!顾先生当时已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而我还是在校就读的三年级学生,顾先生亲自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我怎能不大为吃惊!顾先生把我所送去的稿件带来,并说,有几个字不合适,请您自己改正。还拿来一份别人的稿件,要我替人家修改和补充。此情此景,使我十分感激,对我也是很大的鼓励。

为时不久,到了秋末冬初,顾先生又来到景山北街看我。他说,张石公张老捐赠禹贡学会一座院落,在(北京)小红罗厂,地方很好。顾先生说罢,要我搬到那里去。张老就是张国淦先生,专门从事地方志的整理和研究,当时正在撰著《中国地方志考》,需要有人助理。顾先生推荐我去,工作是搜集资料和起草文稿。张老的住宅在大红罗厂。大小红罗厂是南北相邻的街巷。张老的住宅和所捐赠禹贡学会的房屋,只是一墙之隔,还有角门相通,来往相当方便。

过了新年,1936年初,顾先生命我给他搜集资料和起草《中国疆域沿革史》,并说,这是商务印书馆请他写的。顾先生这样安排

对我来说,确是一番盛意,我却感到惶恐。我当时就是在为张石公张老从事搜集资料和起草文稿,我不能还有别的话说。再说,童书业先生也在为顾先生搜集有关春秋史的资料和起草文稿。既然是起草,最后还要顾先生亲自修改和决定能用与否,我可以不必多所顾虑。

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东北三省早已失去,其锋芒所及已入山海关内。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几同前线,一日数惊。在这样严峻而又恶劣的形势下,顾先生认为这本书中应该突出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并检讨历代疆域的损益盈亏,使国人备知先民经营祖国版图的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易付诸敌人。顾先生认为在一般章节中,首先应该把各时期的疆土广袤讲清楚,特别像明长城、九边镇及清代后期的割地和疆土的损失,都应该作为重点写入。顾先生还提到汉唐盛世,抗拒来自域外的欺凌,可以与当前的情况相对比。这样一些指示,实际已构成全书的框架。由这样的框架进而制定大纲目录,就显现出全书的轮廓。这样的轮廓都是有感而发的,不与承平之时的研究相同。

如前所说,我是听过谭季龙先生讲授这门课程的。这时从事起草工作,师长所讲授的应该最有参考的价值。可是我所记的笔记却和顾先生的指示以及写作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很难配合。就是有所征引,也得考虑到写在顾先生的撰著中是否恰当。因为我只是从事起草工作,并非自己著书。如果按照我的设想来写,我是无法向顾先生交代的,也会辜负顾先生对我的盛意。后来在向商务印书馆交稿时,顾先生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的后面,使我大为吃惊,固辞不获。这就仿佛是顾先生和我合作撰著的,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根据顾先生的指示和大纲目录的规定,这本书固然是要讲历

代疆域的变迁,这就已经很不简单,可是也还要讲前哲时贤对于这门学科的研究成就,虽然只是一章,所涉及的范围却至为广泛,再加上绘制地图、编定表格,更是相当繁杂。这使我深感困难。顾先生了解此种情况后,一再鼓励,并给我一年多的时间,使我能够稍有辗转的余地。在顾先生亲自指导下,我夜以继日,尽量多阅多读,广泛搜集资料,做到广征博引,不囿于一家之言。这样的努力苦学,虽说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实际上不啻度过十载春秋。完成起草工作只不过是向顾先生有所交代,最大的获益,应该说是奠定我此后治学的基础。迄今数十年中,能够稍有寸进,溯其渊源,都在于此。顾先生这样的指导,是我没齿难忘的。

这时虽甚忙碌,我还就翻检所得,撰写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为《秦县考》,考证我所认为的秦县,文前并写有总序。秦县问题不少,我不敢率尔确定,因送请顾先生审阅。顾先生即以之编入《禹贡》半月刊。排好校样,顾先生亲自校过两次,要我再校一次。我感到总序有点欠妥,因另行写过。写好后,我又感到困难,我不知该如何向顾先生谈起。最后还是冒昧将改写的总序夹在校样中,一并送上,没想到顾先生把原来排好的校样撤出,另排改写的总序。重新排好后,还是亲校了两次。作为主编的前辈长者,这样的爱护后学,真是前所未闻,如何不令我永铭寸衷^①。

过了几年,我到编译馆工作。编译馆在四川北碚,复旦大学也在北碚,都是抗战期间由南京和上海迁徙来的。顾先生不久也到复旦任教,相见也就容易。我在编译馆工作是顾先生推荐的。具体工作是编绘《西汉地理图》,也是顾先生指定的。《西汉地理图》不以州郡图为限,举凡经济、交通、人口等只要能以图表示的,皆在编绘之列,现在所能记得起的,大约有三十余幅。根据顾先生的指示,编绘的步骤,是在资料搜集具备之后,先行撰写有关论文,再进

行制图。后来收入《河山集》的《娄敬和汉朝的建都》、《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等都是当时写成的论文。顾先生移居北碚后,这编绘地图的工作,我自然经常向顾先生汇报,顾先生也就随时予以指导。这些地图编绘完成后,都送交编译馆当局。抗战胜利后,我离开编译馆,编译馆也迁回南京,南京解放,编译馆不久也被解散,此图就不知下落。

顾先生原来领导一个文史杂志社,文史杂志社有若干工作人员。顾先生移居北碚之后,文史杂志社的经费发生了问题。《文史杂志》由中华书局承印,不需要补助印刷费用,工作人员却养活不住,只好听其离去。杂志虽可继续出版,编辑却无人承当。顾先生要我移居到文史杂志社内,协助编辑。因为我每天都要去编译馆工作,编辑工作只好在夜间进行。好在稿件丰富,不至于过分费力。前后大致有两三年时间。有这么一天,早晨六时整,顾先生就来看我。坐谈不久,即起身回去,好像有什么事要办,却没有嘱咐。过了几天,又这么来一次。陆陆续续几次之后,我才明白,顾先生的来意,是看我开始工作了没有,害怕我耽误了学习的时间。顾先生对我指导和关心,真是无微不至。从那时起,我更不敢稍事延误,仿佛顾先生就在我的身旁一样。

我有幸能在北京和北碚同顾先生在一块工作,使我得窥学问的门径,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来,不敢稍事懈怠,以免有负先生教导的盛情。

核实来说,睽违顾先生的年月还是多的,睽违谭先生的年月更多,但是书信往来和耳提面命仍是相仿佛的。

二 发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

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有悠久渊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

记·河渠书》^②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③。有人还再往上追溯,溯到《尚书·禹贡篇》。《禹贡篇》为托名大禹的撰著,现在绝大部分学者皆已认为是出自战国时期人士之手^④。《禹贡篇》所述的地理,实为战国时期的地理,应是其当代的地理书,而非历史地理的著作。不能因为其历时久远,就改变其时的地理书为历史地理的著作。

司马迁的《河渠书》为《史记》的一篇,班固的《地理志》亦为《汉书》一篇。《史记》和《汉书》皆为史部巨著,《河渠书》和《地理志》当然都是史部著述。《隋书·经籍志》分列群书,即以地理书归于史部之中。自后治目录学者,皆祖述《隋志》旧规,未有改易,以迄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均一例相承,视为当然。《隋志》如此著录,乃是根据《周礼》的规划。《周礼》以春官、夏官、地官、司徒分掌图籍,以冢宰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而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以总为史官之职,故《隋志》即以地理诸书,著录于史部之中。而其所著录的地理群籍,也往往言及前朝往事,可见《隋志》著录亦非率尔谰言。其后撰著日多,实为盛事。于当地的建置废省沿革损益,皆能历历言之,引人注意。可是在这许多撰著之中,间有差参不齐之处,更难免相互讹误,彼此抵触,这就需要考核证实。酈道元《水经注》中于此用力尤勤,是证不少,后来者群相追效,寢假成为专门之学,乾嘉治輿地之学者率皆精此,因而有了沿革地理之学。当年顾颉刚先生发起组织的禹贡学会,虽已采用历史地理的名称,实际上仍多从事沿革地理的研究。建国以来,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新兴学科自与悠久渊源多有违异,其中一点就是这门学科应列于地理类中,不宜再以之作为史部的附庸。不过由于所论述的皆是历史时期的往事,所征引的资料又多出于文献记载,皆与历史有关,仍应以之作为史部

的辅助学科。此议虽非自我所发,我是完全同意赞成的^⑤。

以前我曾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拟定这样的定义: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探讨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⑥。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是这样一门学科,应该有其社会功能。研治这门学科的人就应该发掘它的社会功能。

这样一些设想和讨论以及这门学科定义的拟定都是建国以后新事,以前不是就没有这样的设想,这是逐渐由于社会的变化和个人的某些经历才略显眉目的。

回顾早年时候,我初始问学,即对乾嘉诸大师深感钦慕。他们考证史事,多能寻根究底,鞭辟入里,时见精邃,而于钱大昕尤甚。我大学毕业时所撰的论文,即为《钱大昕之史学》^⑦。后来又陆续效法,撰写过一些以考为题的文章。七七事变发生,我身陷危城,辗转绕道,颇历艰辛,始得归来。当此大难之际,竟未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样的文章究竟于世何所补益?可是如何有益于世,一时也难以说得具体。

经过几年飘泊的生涯,才又恢复到旧日的营生,到编译馆工作,因而能再同顾先生同处一地,时相晤面。我这次再见到顾先生,就提出我这几年来的感受。顾先生也认为我的这些想法合乎道理,并且说欲求有益于世,应于沿革地理之外,兼治地理之学。话虽如此说了,具体的工作却是编绘《西汉地理图》,还是离不开考证的。只是在政治地理图之外,兼绘制其他方面的人文地理图和一些自然地理图而已。就是按照顾先生的指示,补学地理学,还谈不上能够有益于世。欲求以这门学科有益于世仍有漫漫长途,需要努力跋涉。

虽然才力有所不足,但此心却是按捺不住。历史上有两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从来都受人重视:一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通沟于齐鲁之间,也就是开凿济水和泗水之间的菏水;再一是战国时期,梁惠王所开凿的鸿沟。菏水凿通了,促使荷水分济水处的陶成为“天下之中”的大经济都会^⑧。鸿沟是一组渠道的总称^⑨,不仅有利于交通,也便于灌溉。鸿沟开凿成功后,相当于现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内都富庶起来。这种人工开凿的运河效益都是很大的,在以后的朝代里,还陆续有新的兴建,都能获致相当的效益,只是时过境迁,先后归于湮废。现存的仅有一条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可是也有些段落不能通航了。这些运河是不是可以恢复或创新?就时常萦于脑际。一俟抗战结束,时届承平,似能语此。当时以此意向顾先生陈说,顾先生深表赞同,嘱咐着手撰写成书,并代物色出版书局。这是我撰写《中国的运河》的来由。此书虽然再版重印,却没有取得若何效果^⑩。现在看来,历来的运河是都涉及到了,却未能稍离考证的窠臼,因而难得期望有实际的效果。

我不是在这里反对考证。考证是一种治学的方法,特别是治史学者更不能离开考证。首先是史料的来历和真伪都有待于确认和证实。如果疏于此道,虽也能有所论述,实际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有的考证工作一经确定后,就算是达到目的,不必再事画蛇添足。其实要说明所欲论述的问题,这只能算是起码的准备工作,似不宜就此戛然而止。甚而所考证的只是其中某些方面,若统论全局,也就显得有所不足了。

菏水和鸿沟的开凿成功,确实是尽到了人为的力量。但这样巨大的工程,并非仅靠尽到人为力量就能顺利告成,起码还应有先决的条件,就是黄河和济水在当时的流量都是相当大的,渠道开凿

成功,就会有水流入。现在济水久已断流,可以不复道及,就以黄河而论,流量显然减少,有时甚至断流,如何还能说得上开渠引水,漂浮船只?

这次尝试虽然没有显现出什么眉目,但是却使我相信,这门学科是会有用于世的。因之我还一再尝试。五十年代初,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报道,据说那一年我国出口的生丝和丝织品,所得的外汇可以兴建一条由满洲里达到广州的铁路。这样的数字应该是很大的,使我感到惊喜。那时我国能出口生丝和丝织品的地区,只有太湖周围各处。太湖周围的蚕桑事业自来是有基础的,但抗战时期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迄未能恢复旧观,就是这样还能有如此的成就。如果全国各地可以种桑养蚕的地区都能发挥出力量,那就一定更为可观。由此推想,黄河中下游本来就是种桑养蚕最为发达的地区,只是后来衰落了,连当地的人们对此都感到生疏。如果能够恢复起来,其成效必将远远超过现在这样的规模。有此设想,我就撰写了一些文章^①,也在我所能参加的一些场合中从事鼓吹,结果又是毫无作用,甚而被有些人当作笑谈。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各地相继兴起,据传媒报道,山东的出口商品中,丝织品也占有相当地位。这使我相信在黄河中下游恢复蚕桑事业并不是不可能的。

虽然所见所说都无济于事,但尝试之心并未因之而就此终止。在这些尝试之中,可以提到的是解决西安城的用水问题。近些年来,黄河流域普遍感到水资源不足,黄河竟然不止一次的断流,就是充分的例证。作为城市用水的困难,西安最为突出。由历史上考察,并非从来就是如此。这样的例证很多,用不着多所列举。远在唐代,都城长安就在现在的西安。当时长安城内可以行船,这在现在说来,宁非怪事!那时石炭尚未发现,都城中炊膳取暖,皆需

南山的木炭,有人出主意,引南山流下的滴水,开凿渠道,通到都城之内,用船运载,可以省力。这事轰动都城,连当朝帝王也亲自出来观看。此事史籍迭有记载,应该是确实无误的^⑫。可见当时滴水流量是很大的,就是南山上流下的其他各河流也都是是一样的。现在滴水流量很小,行人可以徒涉而过。滴水之东的浐水,每至夏令,甚至经常断流。为什么如此?是值得深思的。这些河流发源于终南山上,源头各有泉水。河流流量减少,是否与受地震影响泉水耗竭有关?以前关中曾经有过地震,但震源较远,对泉水盈竭还不至于有若何影响。河流流量也与降水有关,终南山上及其附近地区固然曾经发生过多旱灾,却也有不少雨涝的年月,旱涝迭见,并非一直干旱下去,使河流流量不再增长。核而论,应与终南山上的森林遭受破坏有关。森林可以涵蓄水分,降水为森林涵蓄,逐渐外流,河流流量不至于有很大变化。山上若无森林覆盖,降水尽行流出,雨过天晴,河流流量自难有所增益。终南山上森林自来浓密茂盛,由终南山流下的河流,水源都相当充沛。后来森林滥遭砍伐,破坏殆尽,故有关河流的流量也就相应减少,甚至西安城郊的用水都感到困难。为今之计,应培育终南山上的森林,增加河流流量。此项工程相当浩大,不易早日见效,可先培育水源林,稍解当前的困境^⑬。1992年,我将这个设想和建议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经陕西省林业厅和西安市林业局邀集西安林学专家审议,认为这是“根本解决西安用水困难问题的重要措施,建设这项工程意义深远”,并责成西安市林业局成立水源涵育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秦岭北坡,即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四县山区部分水源涵养林的建设工程。后来听说,中央林业部过问此事,并规定每年由林业部拨款两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建设经费。这使我深感荣幸。因为我的建议惊动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立即见诸实

施,显示对西安缺水的关心,也说明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能够有益于世的。

应该指出,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主要河流,流量都有变迁。其中黄河支流有渭水、汾水和沁水,海河支流有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水。这些河流除沁水外,本来都是能够行船的。只是航程的长短各有不同而已。后来这些河流的流量都有所减低,因而难于继续行船。迄今沿流用水都有困难。为什么流量减低,这与地震旱涝无关,也是沿流森林破坏有以致之。应该像在终南山培育森林一样,先从培育水源林做起,再逐渐推广栽培,稍假以时日,是可能得到相应的成效的^⑬。

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能够有益于世,应该是全面的。这里所说的设想和建议,只是其中的一端。也就是在1992年,我在西安召开过一次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北京、上海以及许多省区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皆不辞辛劳,远道莅临,相聚一堂,共同探讨。在会上我作了以《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益于世的作用》为题的发言,并举出若干史例作为证明。这次发言深得与会学者的赞许,并嘱为写定。此文即掲載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三辑中。后来辑印《河山集》第七集,拟将此文附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傅璇琮先生得见此文,即以之再次掲載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一期中。这样的设想能得当代学者的赞赏,私心颇为欣慰。深愿从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共同努力,使这门学科瑰丽光大,充分发挥其为世所用的作用。

三 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 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方法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种专门学科,又是有益于世的学科,应该

得到更多的学人从事钻研讨论。如何研究？应该各有方便的门径。我认为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为研究这门学科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法。

以上所说，经过建国以来长期的共同论证，中国历史地理学应列为地理学学科，以其钻研的范围以历史时期为主，也应以之为历史学科的辅助学科。作为地理学科就得运用地理学科的方法从事钻研。起码实地考察的工夫是不能或缺的，既然是研究地理，如之何不与实际地理相接触？就是作为历史学科的辅助学科，也应该从事实地考察。其实，实地考察的工夫并不是研治地理学科所独有的。就是研治历史学科也同样可以运用，而且早已有人运用过。司马迁当年撰著《史记》，就曾经走遍全国各处。据其自序所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阨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还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⑤。酈道元撰著《水经注》，也曾到过许多地方。《汝水注》中曾说到寻找汝水源流的经历，并说“既在经见，不容不述”。汝水发源的地方，“岩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汝水所流经的蒙柏谷，更是“左右岫壑争深，山阜竞高，夹水层松茂柏，倾山荫渚”。如果不是亲自到过，如何能描述得这样具体。可是我自束发就读以来，总是伏处斗室，少事游历。当时也曾诵读过《太史公自序》和《汝水注》，仿佛是高人雅士，难得企及。回想起来，这迈出书斋的第一步，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后来到底还是迈出书斋，登山涉水，到处考察。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历史地理是一门有益于世的学科，才能使我迈出书斋。促成此事的，并非前辈学者，而是一位将军。这事始于1972年，当时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要写一部《陕西历史军事地